

---

在下面這篇文章中，實物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闡明了貫穿人類歷史的兩大思想學派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根本分歧。文章中拉魯旭先生引證了許多思想家和科學家的著作，其中有很多今天的普通讀者可能不太熟悉。由於篇幅限制，我們不可能注釋每一文中提及的人物。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一些最偉大的人類思想家的名字實際上被抹去了。拉魯旭先生及其同事的業跡就是把許多這類思想家的著作再現于世。對有興趣的讀者，我們建議您對比一下拉魯旭先生區分的文藝復興思想家和啓蒙運動思想家的觀點。

本文是拉魯旭先生撰寫的兩部分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由於技術性太強，我們不準備將之譯成中文。若有興趣閱讀英文版的第二部分，請致函要求我們提供“為何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主多是江湖騙子”的第二部分。

---

【經濟論文】

# 為何說諾貝爾經濟獎 獲主多是江湖騙子

林登·拉魯旭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

今天，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國家都受制於一個世界的貨幣金融體系，即所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一體系行將退出歷史舞台。二十世紀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早可能在數周內發生，最遲也不會晚過一九九七年初。

現今貨幣金融體系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它有可能經過各國政府分步驟進行的破產重組而消散，或者如果各國政府像哈姆雷特所說那樣，「膽小如鼠」不敢面對這一現實，那麼這一危機的發展將導致當今貨幣金融體系的徹底崩潰就發生在二十四到七十二小時之內。這就是說，該體系將在所謂「反向金融杠桿」的內向爆炸中煙消雲散。

這個結論不應令人吃驚，任何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都會毫不猶豫地同意前述的觀點。他們和所有誠實的新聞媒體應該早就在過去數年中甚至數十年中向各國政府發出過這一危機的警告。可以告訴大家的是：本文作者在過去三十年中，反復準確地預見到這一危險。在七十年代中期，本文作者在與戴高樂總統的前經濟顧問杰奎斯·魯夫（Jacques Rueff）先生等著名人士的私下會晤中預見到這一危機的一般特征。在最近幾年中，為數寥寥的少數幾個卓越的經濟學家之一、法國的諾貝爾經濟獎獲獎人毛里斯·阿來（Maurice Allais）也反復公開地提醒人們注意這一行將發生的危機。

但是直到幾個月之前，大多數受到舉世公認的經濟學家還在向世界表示他們的水平低下。美國加州橙縣和墨西哥問題爆發之後，他們還不斷地嘲笑這些警告，雖然在當時一場金融體系的早期鏈式反應總崩潰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特征，而這些特征更使人想起與著名的魏瑪德國共和國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的崩潰。

現在，隨著橙縣破產事件和墨西哥危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著名經濟學家和銀行家不得不承認：現今的體系正處于四分五裂之中。有人也許可以這樣說：遲到總比不到好。我們是否更應該說經濟學界和銀行家們在過去二十五年多的時間中遭到了慘敗？我們是否必須說，他們理應在幾十年前就看到這一趨勢，理應在當時就警告各國政府和公眾繼續執行這些錯誤政策的惡果已經開始顯現？

爲何這些受過多年教育、智力不低的人們在流行的經濟學教條面前就像在狂歡節中傻乎乎被把戲玩弄的人呢？要明白這一點，我們必須揭露一些根深蒂固、漏洞百出的經驗主義科學推論。正是這些錯誤的推論，決定了一般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走向。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前面提到的情況向美國和其它國家政府提出了三個有關決策的問題：

第一，爲什麼大多數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在過去三十年中幾乎無一例外都遭到可恥的失敗？

第二，我們在過去二十五年中爲什麼要容忍這些不可避免會導致全球實物經濟崩潰的經濟、貨幣和金融政策？爲什麼要容忍這些不可避免會導致歐洲歷史上最嚴重貨幣金融危機的經濟、貨幣和金融政策？這一危機的破壞程度將毫不亞于十四世紀中葉由英國引起的郎巴德債務危機（1）

第三，爲什麼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政府和「公衆輿論」支持的這些政策都來源于這些顯然是精神錯亂的經濟教條？這些教條與前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夫里·賽克斯（Jeffrey Sachs）、參議員費爾·格蘭（Phil Gramm）和美國衆議院議長紐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的說教如出一轍。

## 一、當前的經濟危機

在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之前，我們要看看這場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一些主要現實情況。下面結論所基于的數據是世界各國政府和主要經濟學家都能通過公開渠道獲得的統計數據。

爲了比較美國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九四年間每人平均收入與產出的變化，我們按一定標準對這些統計數字進行了歸納。我們把這些可公開獲得的數據換算爲人平（2）、每戶平均和地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實物經濟持有量。

我們把投入定義爲人平和戶平的消費量，定義爲農業、采礦業、基礎設施工業、製造業和建築業的消耗量，定義爲政府和私人部門中銷售人員與行政人員的可行比例，使用美國一九五六年的數據爲「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中生產銷售和行政人員所佔的可行比例」的基數，以資比較。這就得出個人、家庭、基礎設施業、生產業、生產銷售人員和行政人員的「消費市場籃」。當然，所有這些都是按人平、戶平和地平衡量的。我們將產出定義爲消費市場籃里所有項目的生產。

市場籃里的內容僅限于有用的實物，其量度是實物（而非貨幣）量，再加上三大要素：教育、醫療保健和科學技術。這三大要素對維持和改善人口的特質，維持和改善勞動生產力是必不可少的（3）。

對這些市場籃必要性的估價是間接的。關鍵的問題是，對人口特質和生產力（這些市場籃內容的產出投入比）的實際影響是什麼？整個市場籃中某些項目是增加還是減少？我們將「意義上的經濟平衡」定義爲一種趨勢，即一種實物經濟增長率。這是按人口特質和產出投入比的增長改善衡量的，其年率大約爲百分之五。

我們可以在這裏運用一下大學理科課堂上常用的想像力，把這一「意義平衡」定義爲代表實物經濟生產總過程中某一點的「能量系統」。與之同時，我們也同樣使用產出投入比的概念，將之定義爲「自由能」與「能量系統」之比（4）。這一概念要求我們表示，一個健康發展的、非退化（即可持久的）經濟，從性質上說是「非熵」的（5）。

按這一標準來分析，使用政府機構和私營部門均可自由獲得的有關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從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期間，美國的實物經濟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圖一—圖三）。總的說來，現有統計數據足以證明，這一下降趨勢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的特徵。這些統計數據還表明。雖然這一災難性趨勢在一九六三年之前就有些征兆顯示，但主要還是由於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二年間採取的一系列激進政策措施，導致了一九七二年以來全世界實物經濟的持續下降。

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間，從事我們在上文定義的「系統能」生產的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百分比不斷下降（見圖四），與之同時，從事這方面生產的勞動力的實物生產率也持續下降（見圖四）（9）。美國的情況是這樣，全球的情況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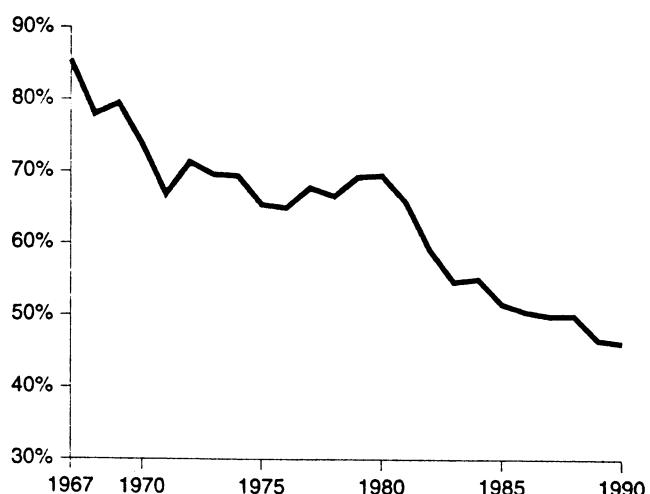
其次，我們可以把實物經濟的發展趨勢與貨幣金融的發展趨勢作一比較。讓我們從最簡單的比較開始看看對外貿易與外匯交易之比的變化。

一九七六年，美國的日進出口貿易額佔美國的日外匯交易額的百分之二十三。在一九七九年十月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A Volcker）提出的愚蠢之至的政策變化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一九八一年，外匯交易量中對外貿易所佔的比重降到大約百分之五（見圖五）。一九九二年，在喬治·布什總統之下，這一比重進一步降到百分之二之下。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統治下的英國，這一比重更降到大約千分之五之下。就全世界範圍而言，這一比重的平均數下降到大約百分之二。今天，如果把「帳外」的衍生金融交易計算在內，可以毫不夸張而有把握地說，世界總貿易額佔世界金融交易量的比重還不到百分之一。

一句話，世界的貨幣金融體系已經與實物經濟「脫節」。官方報導的所謂「經濟增長」是一個騙局；我們這樣說主要是因為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第一，國民總產值／國內總產值這些用來報告假想經濟增長的數據，是基於貨幣的估計增值量；因此，自貨幣金融體系與實物經濟脫節以來，即便是未摻假水的國民總產值／國內總產值數字，也完全沒有反映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第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對這類數字進行統計分析時當然總是肆無忌憚的撒謊。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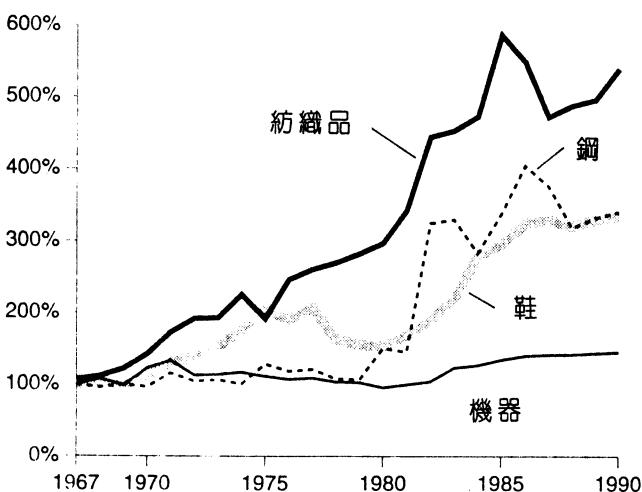
生產實際需要的勞動力所占的百分比



“實際需要”是由實物“市場籃”和維持并提高勞動生產力所必需的基礎設施總和所決定的。圖一示出，在過去三十年中，美國經濟中生產必要實物和基礎設施所必需的勞動力占整個勞動力的百分比不斷下降。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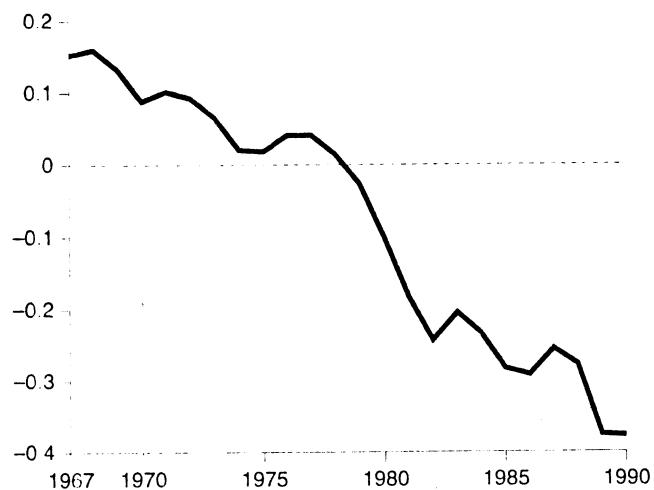
生產一九六七年規模的市場籃所需要的勞動力的百分比



圖二示出，要達到美國一九六七年生產出的紡織品、鞋、鋼和非電子的機器的水平所需要的生產性勞動力的百分比。這些百分比表明，生產性就業必須不斷增加以滿足生產規模的需要。

圖三

美國經濟中金融業利潤所占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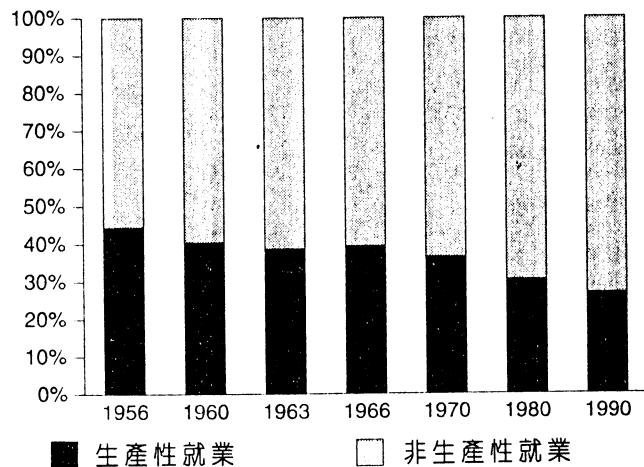
圖三表示出美國經濟中金融業利潤所占的大致比例。即：製造業的毛利減去借債服務成本，然後除以直接成本（工資、材料和新投資等），再乘以實際利率（借債服務成本除以總債務）。

貨幣金融體系與實物經濟的這種脫節，完全反映在過去三十年中政策發展趨勢的變化中。這類變化始自所謂「文化範式轉變」，即一九六四年間有人組織導演的大規模社會變革現象。這類反科學（反理性）和「後工業化」的「新馬爾薩斯」主義理論進入了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二年間大學校園中反戰示威者的頭腦，使這些原本狂熱，以縱欲為樂、吸食大麻為榮的學生更成問題。這就是一個例子（6）。在一九六六年之後，倫敦塔維茨托克研究所成功地迫使美國首次大規模削減科學（空間）計劃。其論據是，空間計劃的成功使過多的美國人不僅喜歡科學，而且崇尚理性。同一年里，美國國務院首次提出新馬爾薩斯主義建議，主張把人口控制納入美國的對外政策（7）。在這一期間，喬治·布什衆議員因其不懈地推崇生育控制工業而贏得了「套套先生」的綽號（8）。一九六七年，布熱津斯基發出他自己的「新人類」的啓蒙：從基督教轉向了「第三次浪潮」（9），變成了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羅伯特·西奧伯德（Robert Theobald）、托夫勒和威廉·里斯-摩格勳爵（10）（William Rees-Mogg）的「信息論」（11）新異教信徒。

圖四

一九五六至一九九〇年間美國勞動力中從事生產性工作的人和非生產性工作的人的比例

占整個勞動力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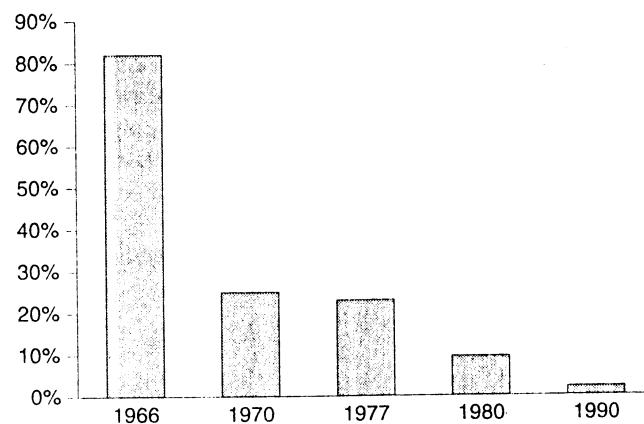


■ 生產性就業

□ 非生產性就業

圖五

一九六六至一九九〇年間美國商品貿易占外匯交易的百分比不斷下降



這些大規模的洗腦工作，為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二年間美國轉向「新潮期」鋪平了道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至十六日，美國尼克松政府決定美元與金本位制的布雷頓伍茲體系脫鉤。這一決定先入為主地確立了世界範圍的「浮動匯率」貨幣制度，以之取代了在布雷頓伍茲簽約定下的後工業化貨幣體系。

原來的布雷頓伍茲協議在一九七二年亞速爾群島會議上正式瓦解。由英國倫敦石油銷售卡特爾在美國國務卿（和英國特工）亨利·基辛格（12）的幫助下而掀起的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石油價格衝擊」，打擊和嚴重破壞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的工業國家。倫敦「石油價格衝擊」的結果，促使了一九七五年蘭布萊貨幣會議的召開。在會上，通過「浮動匯率」投機來掠奪經濟的作法被奉作神靈，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朽的上帝。

導致現今這種經濟急劇崩潰局面的另一個決定性事件是在一九七五年。那年的春天，沃爾克在競爭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時，宣布他認為「有控制地瓦解〔世界〕經濟」是新上任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可以接受的政策。這些話以及沃爾克後來任職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做法，反映出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弗雷德·赫西（Fred Hirsch）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八十年代規劃>>一書中提出的建議，該書也為即將上任的吉米·卡特總統提供了政策建議。卡特所任命的萬斯和布熱津斯基都是對外關係理事會政策制定方面的關鍵協調人。從一九七九年十月開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沃爾克突然啓用赫西「有控制地瓦解經濟」的做法：急劇提高優惠利率，使之遠遠高出任何誠實企業所能實現的利潤率。由於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實施沃爾克措施的災難性後果，從生產性部門流向純粹金融投機的金融資本和實際資本的淨值越來越大。

沃爾克的政策措施，再加上另外兩個災難性的立法，即聖吉美因－加爾恩法和格拉姆－魯德曼平衡預算法（13），使美國經濟在整個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七年期間陷入以「垃圾債券」為代表的金融搶劫與金融投機之中。一九八七年十月股票市場的崩潰，代表著「垃圾債券」時代行將結束，預示著「金融衍生」肥皂泡的誕生，而這些一吹即破的肥皂泡必然導致現有貨幣體系的提前滅亡。

為了更詳細的闡明這一體系為什麼必定會在今後幾個月內徹底崩潰，我們需要看看具有諷刺意味的衍生肥皂泡。

肥皂泡的核心，是以期貨為形式的金融衍生物，美其名曰「投資」，只是其名聲暫還不如蒙

地卡羅或拉斯維加斯賭場里的賭博。毛里斯·阿雷又將其恰如其份地稱作賭場經濟。日本的顯要人物至少在兩次公開場合稱這些「衍生物」為世界貨幣金融體系的「金融艾滋病」。在我早先出版的教科書中，我常常提到金融經濟領域里的「衍生物」類似於我在以前教科書中所說的癌癥，類似於生理數理學家尼古拉斯·拉什夫斯基（Nicholas Rashevsky）所說的癌癥。

這就是今年初把著名的霸菱銀行拖入破產境地的金融賭博。這一事件發生在當今世界主要的金融娼妓中心新加坡的霸菱銀行新加坡分行。他們在新加坡的工作人員在東京的股票債券市場上投下數十億美元的賭注，以圖短期收益。這不是什麼投資，而是賭場上的賭注。霸菱失去了賭注，并因之而墜入破產。衍生物投機是不折不扣的賭博，常常拿其他人的大量金融投資來冒險。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式的南海及密西西比肥皂泡則是與之相對的金融保守主義的典範。

實際上，今天令人瞠目結舌的新加坡、倫敦和華爾街雅皮士們倒騰的衍生物賭博與十七世紀金融肥皂泡沒什麼兩樣，唯獨的區別是約翰·洛克之流沒有現代的個人計算機和遍及全世界、分秒不停息的高速通訊聯絡網。約翰·馮·紐曼的博奕論（14）和混沌論（15）再加上這些計算和通訊手段，使得投機的鏈式反映速度在短時間內達到幾近光速的速度。這不僅允許、而且促成投機膨脹速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產生全球範圍的金融肥皂泡的「機制」基本上有三種：一、從數字上看最大的因素是「概念」（虛構）資本的數量，而這些虛構資本則被當作是用于期貨投機的貨幣資本。二、第二大的因素是以衍生物及其有關投資項目為形式而流入金融投機的貨幣。三、從消費和生產環節中掠奪出的實際財富成為投機肥皂泡的基礎。若要確定肥皂泡為何要破滅，怎樣破滅，何時破滅，我們必須認真看看這三大相互影響的機制的作用。

由於一個外行人不明白「虛構資本」這一名詞的意義和功能作用，我們在這裡以兩個例子來說明問題：首先，我們將用簡單的方式來表示，二級股票交易中投機增值（名義上的「資本增值」）是如何實現的。第二，我們將談談六十年代期間紐約破舊公寓業投機是如何進行的。為了



福換從交皮十的機子之于有全高聯計  
蘭幣。今生雅與紀投分同在沒的球訊子  
法貨所事易肩七金倒的處後自天速系算  
機。

弄清「衍生物」投機是如何膨脹、爾後又如何不可避免地像核爆炸一樣突然破滅，只消以二級股票市場上和破舊公寓出租業常見的寄生蟲投機來解釋「衍生物」投機這樣的數字押寶。

第一個例子：一個按十美元一股從W公司購買了一百普通股，共花去一千美元。當時，該股票的預期股息是每股五美元。其後，由於銀行利息的波動，在一個金融投機者看來，每股五美元收益的相對金融價值增加了。這樣，交易商願意以每股十二美元而不是十美元的價格購買W公司的股票。這兩美元的增加純屬虛構，純屬投機，而不是由於投資進入生產環節而帶來的結果。這每股兩美元的投機增值是純粹的金融現象，而不是經濟現象。

讓我們以此為例，往下繼續這投機活動。這時，又成立了一家公司，該公司的唯一收入來源就是W公司股票增值的兩美元所帶來的虛構資本增值。然後，這家公司又發行股票。把發行股票而籌集的資本放在一旁，保障這一股票的資本是純虛構的資產，而不是具有實際經濟意義的資產。假設這一股票定價一百美元，假設每年的預期股息為五美元。這時，該股票價格的波動就是在已經屬純虛設價值的上下波動基礎上形成的新一輪虛設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曼哈頓的破舊公寓出租業。這一例子值得我們更仔細地確定一下一般的虛構增值的基本成因。在所提到的這一時期期間，曼哈頓公寓的市場價值是按預期年租金的數倍來計算的。因此，公寓東主採取各種手段來提高租金，也就可能提高這一日漸破損的公寓的名義市場價值。這就是這一時期紐約破舊公寓的特徵。

用作破舊公寓投資的這座建築的本身價值與此無關，只是這座建築為大量付租金的住客提供了棲身之地，而這棲身之地還低於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標準，類似於馬薩諸塞州林市的「工人階級居住區」，住客一般是一家單住，或兩家合住。按照上面所說的這種曼哈頓破舊公寓投資，住客付出的租金大多只不過是「封建」時代的地租，這純屬虛構的經濟價值。因此，公寓價值的實際購買力可以無限制膨脹，而與之同時，建築本身的實際價值則可以迅速衰落至零。公寓投資的貨幣價值與建築本身的經濟價值「完全脫鉤」。

這樣，在這種虛構增值上進行投機的公司就可以把這破舊公寓投資產生的虛構收入（資本增值）兌現，形成我們在這裡所說的A。然後，我們把在運作A基礎上產生的利潤稱作B。這自然提出一個問題：一個金融投機家需要付出什麼才

有權收取預期的年股息 B？假定這一買家預計年收益為百分之十，那麼，享受年收益 B 的權利大約值 B 價的十倍。這就產生了 C。

這兩個例子揭示出所有金融投機的根本特征。金融衍生物則是把這種以投資為名的投機轉變為純粹的賭博。我們舉出這兩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的目的，是發現虛構價值在造就肥皂泡上的作用：A 生 B，B 生 C。這一金融肥皂泡的特點是：如果這一投機活動的層次不增加，整個肥皂泡就停止膨脹。

肥皂泡停止膨脹時，投資者就將爭先恐後地拋售股票，促成肥皂泡的破滅。這種競相拋售進而將發展成為恐慌。設想一下全球範圍的恐慌，以計算機的速度，借助當代的光纜和衛星通訊設施迅速傳播。恐慌的急劇擴展，就形成一種「反向」的熱核爆炸，在幾小時之內，最多不超過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時，這一爆炸就會導致全球所有的金融機構和中央銀行徹底瓦解。

金融投機活動優維持增長局面，初始貨幣（如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行的美元）必須進入金融投機網這一多層次投機肥皂泡所產生的膨脹效應需要的貨幣量，與新的虛構價值量相比猶如九牛一毛，但是，肥皂泡是否能夠繼續存在，新貨幣的注入至關重要。這一舉債經營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第二種主要的機制。

流入肥皂泡的貨幣形成一種對實際經濟的課稅。即便從字面上講，這也是一種「稅」。中央銀行為了將貨幣注入肥皂泡，必須大舉借債，政府則需要對這種借債服務進行償付。由於肥皂泡的膨脹取決於生產環節中實際資本的外流，由於肥皂泡的運行是依賴借款，所以肥皂泡的膨脹實際上是對社會經濟生活中每一層面的累積課稅。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三種主要機制。

總之，這三大機制的內在相互關係是這樣的：肥皂泡的膨脹將加快虛構價值的增長速度，以避免泡沫反向。由於需要保持虛構價值的增長速率，中央銀行系統必須增加流入肥皂泡投機基礎的貨幣流量，否則，虛構價值的增值就會放慢，從而誘發整個肥皂泡進入反向回車。為了保證流入肥皂泡的貨幣量，政府必須加速借款，這也就增加了對經濟的各種課稅，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掠奪國民經濟，來之撐肥皂泡的投機基礎。

讓我們看看一些圖表，它們反映出克里斯多夫·懷特（Christopher White）、約翰·侯福爾（John Hoefle）和安東尼·維克倫特（Anthony Wikrent）等人在這方面所做的統計研究（圖六至圖八）。

一、從一九六七至一九七〇年的參照期到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五年期間，美國實物經濟的人平消費與產出量減少了幾乎一半。目前，這一下降趨勢還在加快。

二、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九二年間，美國外匯交易量中進出口貿易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二十三降到大約百分之二。如果把已有報道和經過估計的帳面外衍生物投機活動量考慮進去，這一比重還要進一步降到百分之一以下（見圖五）。

三、與之同時，尤其是一九八七年以來，市場上的每日金融交易量急劇上升；自一九九一年以來，金融投機總額的增長率與人平實物經濟產生投入量的增長率之比，無可辯駁地呈急劇上揚之態。

上述三點決定了一個必然的後果：不僅金融業徹底崩潰，而且世界上大多數貨幣金融機構也遭到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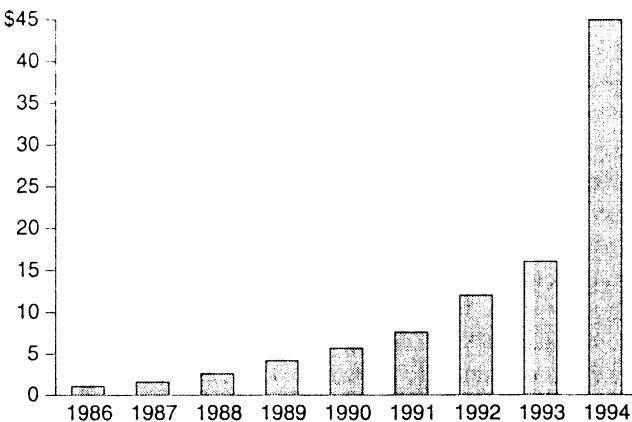
解救這些災難的唯一方法，是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緊急行動起來，讓整個肥皂泡金融系統在政府的監控下，進行破產重組：勾銷虛構資本，保障養老金和個人存款這些為實現社會、政府和實物經濟穩定而必需的資金流動。單靠這些緊急措施還不夠，但它們必不可少。如果各國政府要想立刻恢復經濟，如果這些政府的措施要想奏效，金融肥皂泡的破產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根據一七八七至一七八九年的美國聯邦憲法，恢復經濟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在四十八小時內，美國總統宣布聯邦儲備委員會破產，讓其處於破產重組之下。與之同一天，命令聯邦儲備委員會停止發行鈔票。也就是在這一天，按美國憲法的第一款，向國會提交緊急法案，創造數萬億美元的國庫卷，以供出借。貸款通過（根據國會法案）新建立的國家銀行借出，該銀行是仿效華盛頓和汗密爾頓推崇的美國銀行模式而建立的。貸款的利率為年率百分之一至二，主要貸款給緊急法授權的有價值的基礎設施工程，貸款給與

圖六

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四年間全世界金融衍生物的發展

(到年末帳面上的本金量，萬億美元為單位)



這些工程有關的制造商，貸款給其它優先改慮的指定項目。對新政策成功與否的評估，是看它所創造的生產性工作機會的數量，以及失業人員與無用的就業人員（如金融從業人員）轉入生產性行業的比率。

在這美國政府採取恢復經濟措施的四十八小時內，美國總統邀請有責任感並且願意的國家首腦到華盛頓開緊急會議，確定新的國際貨幣秩序，以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雙邊及多邊關貿協定的新框架；確定保護主義的金融、貨幣和經濟協定，在恢復經濟時保護主權民族國家的共同重要利益。

在我們轉向直接討論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三個問題之前，先把一點結論意見闡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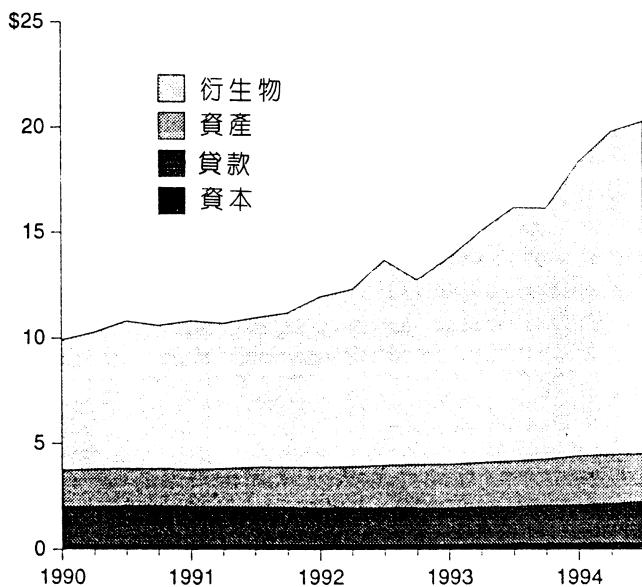
若要明白現有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即將解體的原因，我們必須認識到金融體系和金融體系賴以存在的經濟體系的根本區別。由於這一原因，要解決經濟分析中存在這些我們將探討的問題，必須認識到判斷經濟學是否科學的幾個先決條件。下面我們將在適當的地方探討這些條件，其中有一點必須現在加以討論。

貨幣系統、金融會計和約翰·紐曼「系統分析」中的系統均是線性系統。它們只能表示那些基本呈線性的關係。用大學里的熱動力學的話說

圖七

美國銀行熱衷于衍生物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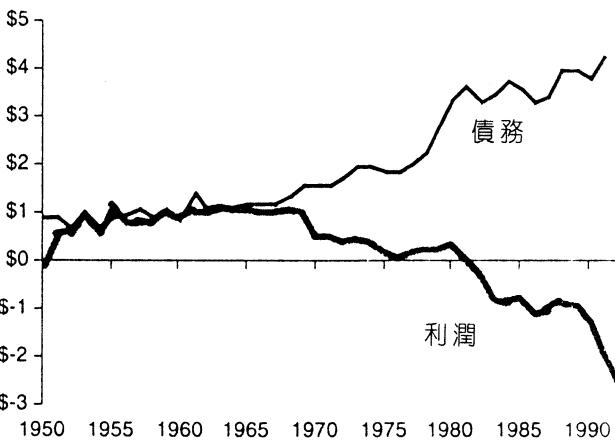
萬億美元



圖八

發展越快…越要滅亡

一九六七年等于一美元



，它們只能表示那些要麼實際上是熵、要麼基本上是熵的系統。

看一看這一事實。人類從最初的最多幾百萬個高等猿人，發展到十五世紀的幾億人，今天則達到五十多億。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是人類有意識的文化變革，家庭人口特徵的進步，人平生

產力的提高。正是這些變化，帶來了新科學原則的發現，即只是存在于人類之中的精神創造力的進步。這些事實表明，人類的活動，從本質上講是非熵的，即非線性的，也不是簡單的「非線性」(16)。

會計學上的貨幣金融系統是一線性系統，它不能反映出實物經濟運行中非熵過程的特點。這兩個系統從理論上講是互相排斥的；但是，一個非熵系統總能表示出一個線性系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過去五百年現代歐洲文明（以及全球文明）發展期間，從十八世紀初到約翰·肯尼迪總統遇難的一九六三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的農業經濟體系，正好是在金融系統和實物經濟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的相互作用下發展起來的。

從經濟分析角度講，這一區別表明：實物經濟的所有實際利潤（有時被稱之為「宏觀經濟利潤」）產生於創造性（非熵）的活動，如實物經濟過程中的技術發展。金融系統無法創造這樣的利潤；它只能從實物經濟中攝取財富。這就導致這一特殊情況：實物經濟未能創造「宏觀經濟利潤」，或者處於一種實物經濟虧損，而與之同時，金融系統卻享有高額利潤。這種實物經濟利潤與金融利潤之間的反常差異，有時被稱為「原始積累」，即掠奪實物經濟，掠奪自然。這就是貨幣金融體系的純寄生蟲作用。

到一九六三年以前，這兩個在觀念上相互排斥的系統處於一種共生狀態：在工業化國家中，金融系統一般只是從農業經濟系統創造的整個「宏觀經濟利潤」中攝取部份利潤。「後工業化社會」概念的引入，在加上布雷頓伍茲體系的解體，「浮動匯率」貨幣體系這種寄生蟲系統的產生，致使這種共生狀態破滅：金融系統從良性腫瘤惡變為金融「癌癥」。

## 二、亞當·斯密，社會學和牛頓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間，由於「運籌學」、「信息論」、「計量經濟學」和「系統論」這些偽科學的擴散，經濟學這門學科一直為江湖騙子所把持，其伎倆就是用通篇的數學符號和準數學符號（如連加符號和整數符號等）來充斥教室的黑板和精裝的書頁。某些這樣的胡言亂語還有一些有限的實際作用。就像警察局偵探的線民一

樣，偵探在上司的許可之下可以隨時使用這一線民，但若要與此線民結婚，偵探就會被炒魷魚。同樣，雖然我們承認這類雕蟲小技有著有限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事實是，說這類數學符號能證明經濟學中的重大原理，簡直是痴人說夢。

過去三十年中，為什麼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認識到當時的政策趨勢實際上是在引導現有貨幣金融體系陷入全面崩潰？為什麼所有這些通曉經濟「服裝」的專家未能認識到皇帝的新衣讓皇帝赤身裸體？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大多數經濟學家也像今天容易上當受騙的外行一樣，堅信科學等於統計學，堅信「普遍接受的學院」式數學是證明科學的標準。

這些專家和多數平民百姓之所以有這種無知，還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是正如我們下面將證明的那樣，這些其它原因來源于同一種錯誤的假定，使專家認識不到普遍接受的數學教科書中的問題。讓我們以牛頓為例來開始這一討論。

牛頓式數理學在三個半世紀前的偉大科學家萊布尼茲（17）面前顯得完全無能。它也是十九世紀初世界科學技術主將、一七九四至一八一四年間蓋斯帕·蒙治（Gaspard Monge）理工學院（18）的嘲笑對象。十九世紀第二科學大師（僅次於其先師卡爾·高斯）伯恩納德·黎曼（Bernard Riemann）把牛頓的方法斥為科盲法。二十世紀的偉大科學發現、邁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量子力學理論，更是把牛頓的因果關係概念駁得體無完膚。這些著名學者中也有少部份人把牛頓理論的其它一些謬誤加以駁斥，并因之而得名。牛頓學家們最感難受的，也許是經濟學家凱恩斯受托檢查牛頓私人文件核心部份的內容。凱恩斯發現，牛頓的工作主要是一種魔術把戲，所有這些文件中基本上沒有任何具有科學價值的東西。

萊布尼茲、巴黎理工學院的蒙治和黎曼等人所抨擊的牛頓數學的這些騙人把戲，也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經典「數學經濟學」的基礎，它盡管毫無價值，竟然還要來解釋經濟實際運行的規律或應該采用的規律。

在這裡，我可以想象，讀者中間也許有人會抬起手指來干擾我們的說法。讓我們聽聽他的反對意見。他所要講的也許可以引證如下：

我想我大體知道你要賣什麼藥了。爲了爭論起見，讓我們假定你對牛頓和數學經濟學的批判是正確的。那麼，你如何解釋今天支持「自由貿易」的人中大多數並沒有受過正規的數學教育，也根本不知道來萊尼茲和牛頓的分歧？換句話說，以你對數學的斷言，如何解釋這些科盲中絕大多數人在一九九四年選舉時投票支持紐特·金瑞奇的「與美國定約」？

讓我們直接回答這一問題。無知與迷信並不僅僅局限于今天的高等院校畢業生。讓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來回答上面提到的異議。這一故事應該能夠使讀者知道一些有關的證據。

一九九二年，本文作者認識了一些正在研究如何靠小額投資通過期貨投機來掙錢維生。當時「金融衍生物」剛剛開始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也是這一投機狂熱開始帶有十七世紀鬱金香泡沫特征的時候。「你看，你絕對輸不了」這樣的口號，最先引起作者注意到衍生物泡沫對他周圍的人的影響。這都是些尋常的人，是些可以歸類爲「一般小生意人」。

「你絕對輸不了」？對之的回答，可以用經過時間考驗的美國諺語：「著名的空話」。上面提到的這些人都不是沒受過教育的，不過也是我們在這裡所說的那種外行。讀者在文化水平遠遠低於上述人的人群中，一定還可以看到類似的社會現象。

在美國也象在其它國家一樣，很難說服華爾街雅皮士階層的人信服這一原則：得到了鄰居保險箱的密碼並不等於有權擁有保險箱里的內容。「我解開的密碼，這是我的！」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並不關心他們所研究的賭博方法對經濟有什麼用處，或者說在道德上有什麼意義，唯獨的目的就是希望以之致富。這一賭博的信仰者大多也不承認他們的獲利會帶來其他人的損失。他們大多相信「你沒見嗎，沒人會輸」這一概念。「沒人會輸」，真是笑話：大家還記得招徠加入「連手寫信大串連」這一騙局的聲音吧。

以一個現代蘇格拉底信徒的眼睛來觀察「沒人會輸」這一錯覺，就可以恰當地回答上面那一假想對立派的問題了。參加「連手寫信大串連」騙局和「金融衍生物」賭博都有一個錯覺，那麼決定這一錯覺的原則性假定是什麼呢？

決定上面提到的這一社會現象的各種原則性假定中最陰險毒辣的有兩點：第一是唯名論形而上學的謬斷，認爲金錢就是財富，因爲它可以有明顯的力量來控制財富。第二個謬斷是朱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夫人歸納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畢生學術工作的精華：假說要證明的也是假說。雖然弗里德曼主義經過一定的改頭換面，以適應那些常說「他們的智商低於他們的體溫」的人，但就我們的目的來說，其有利之處在於弗里德曼主義直接了當，沒有用什麼表面文章來轉移我們對這些原則性假定的關注。

在這裏，我們對假想對立派的回答先假定：專業人員和科盲們都承認那些普遍接受的學院式經濟學理論是權威理論。他們之所以這樣作不是因爲他們懂得其中的學術奧妙；這些教條之所以盛行是因爲它們迎合了植根于現行大衆文化中的那種無知愚昧的假定。上面提到的那兩種原則性假定得到廣泛的接受，表明根深蒂固而普遍接受的大衆觀念如何造出一種似是而非的東西，使得經濟學家蟒蛇得以蒙蔽大衆小雞。

如果讓我們繼續引用歷史事實來回答假想對立派的反對意見，會更節約時間。

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從十七世紀初開始，盛行的經濟理論也就是今天普遍接受的學院式數學賴以成立的原則性假定。所有這些比較盛行的當代學院式社會科學理論，無論是叫經驗主義也好，還是叫實證主義也好，或是叫行為主義也好，都直接來源于牛頓及其信徒那在原理上漏洞百出的數學思想。二十世紀在美國盛行的各種公立學校和高等教育的模式，二十世紀在藝術和大衆娛樂形式上的各種發明創造，各種有關精神健康的新概念，各種普遍接受的大衆傳媒的所謂「新聞報道」，都是流行社會理論的產物，而這些流行社會理論的基礎則是按英語習慣常常稱爲「牛頓力學」的數理學。

牛頓對早期數學發現的拙劣模仿（19）和與之對應的社會理論，其目的就是提倡盲目崇拜有關人性、自然和因果關係的白痴理論。這些理論在當時就已經進入尋常百姓之家，而在今天則彌漫到世界上的多數大學之中。

現代的經驗主義經濟學發源于對封建地主貴族的社會統治所做的讓步（20）：所謂弗朗索·奎斯內（Francois Quesnay）博士的重農主義。奎斯內以封建貴族的奇怪心態來反對國家干預的中心思想是「自由放任」，這一思想後來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走卒亞當斯密譯成英文中的「自由貿易」。唯一的區別是：亞當斯密的學說把社會的統治權從封建貴族手中轉到威尼斯的封建金融貴族手中，其代表人物就是東印度公司的所有者——巴林斯銀行和英格蘭銀行（21）。帕爾默斯頓（Palmerston）勳爵的寵兒卡爾·馬克思站在亞當斯密和「自由貿易」的立場上反對美國，只是主張把對社會的未來統治權從倫敦金融貴族轉到一種未來的世界政府手中，即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只要了解了奎斯內、亞當斯密、馬克思和勞思安學派的里昂·沃爾拉思（Leon Walras）的基本思想，當今普遍接受的學院派經濟學的每一個基本觀點都完全可以按線性數學模型來解釋。

下面談談另一個所謂的「社會科學」。當今大學教學大綱里的「政治學」就像社會學一樣，是由牛頓的波旁復古派信徒發明的。他們中間最著名的有：實證主義者聖西門和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埃米爾·都海姆（Emile Durkheim）讓「社會學」成為大學的「學科」。所謂人類學也擁有十九世紀法國實證主義信徒。行為心理學最初的幾個分支也是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實證主義在十九世紀的翻版。今天在大學和研究機關奉行的歷史方法還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思想的創造。即便是當今的法律思想及其實踐，主要也是來源于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反正統潮流（22）。

藝術和與當今「大眾文化」有關的其它形式也都能找到這些謬端的痕跡。

### 經驗主義之父

現代經驗主義及其產物——普遍接受的學院式數學和社會科學理論，均來源于數學家、勢力頗大的教士保羅·薩爾皮（Paolo Sarpi）。薩爾皮何許人也？他的信徒在一五八二年奪得威尼斯的控制權，并以此權力發起了威尼斯寡頭集團控制英國和荷蘭的進程。薩爾皮的行動導致了一七一

四年英國君主制的建立和後來一七六三年大英帝國的建立。

薩爾皮在奪取英國這些有勢力機構時所用的人員包括數學家伽里略、弗朗西斯·培根和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伽里略有三個數學學生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人們更多地知道他是弗朗西斯·培根的親密朋友。在這些人之後，又是雷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約翰·洛克（John Locke）、牛頓、大衛·休謨、孟德斯鳩這些名人，以及像伏爾泰·皮埃爾-路易斯·毛柏圖（Pierre-Louis Maupertuis）、吉爾馬利亞·歐特拉斯（Giammaria Ortes）、弗朗西斯科·阿爾加羅提（Francesco Algarotti）、尤拉、約瑟夫·拉格朗日（Joseph Lagrange）、馬吉斯·拉普勒斯（Marquis Laplace）之類的十八世紀牛頓走卒（和萊布尼茲的反對派）。

庫沙的《論學到的無知》（De Docta Ignoranta）一書，在一四四〇年建立了現代科學。該書對帕西奧力和達芬奇這兩位自己宣布為庫沙信徒的人產生了重大影響。到十七世紀初，名聲最大的庫沙·帕西奧力和達芬奇的信徒是現代綜合數理學的創始人開普勒。開普勒的信徒中有蓋斯帕爾·德薩古斯（Gaspard Desargues）、皮埃爾·費馬（Pierre Fermat）和帕斯卡這些著名的法國數學家。庫沙、達芬奇和開普勒的信仰者還包括荷蘭人克里斯汀·惠更斯（Christian Huyghens）和德國人萊布尼茲這些法國柯爾貝爾主義者。庫沙追隨者所建立的現代科學，其基礎就是已經確立的古希臘柏拉圖雅典學院和阿基米德的學說。

庫沙建立現代科學的同時，也運用古希臘的文化傳統，深化了詩歌、音樂、悲劇、繪畫、建築等藝術革命，促進了城市建設和開拓新世界。從十四世紀「新黑暗時代」脫胎換骨而出的十五世紀歐洲的科學藝術奇葩就是文藝復興。

庫沙、達芬奇、開普勒和萊布尼茲開創的現代科學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他們的理論基礎是柏拉圖敵人亞里斯多德的演譯行而上學方法。威尼斯的亞里斯多德走卒力圖詆毀現代科學，其表現就是保羅·薩爾皮躍升到威尼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決策層。薩爾皮的新亞里斯多德思想，至少有部份是來自重名主義，它後來造就了各類經驗主

義，即所謂啓蒙運動。

平心而論，過去五百年來歐洲文明的歷史就是威尼斯掀起的啓蒙運動與文藝復興的鬥爭史。這兩派持有互相對立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這些基本哲學上的差異，表示了在社會因果關係和人與宇宙的相互作用（為實物經濟生產）觀念上的相互對立。這種文藝復興思想與反對啓蒙運動的經驗主義思想之間的對立，決定了過去五百年中的現代歐洲文明史。

這一思想對立有著易于識別的實際基礎。

在西歐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之前，各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生活條件惡劣，過著非人的生活，從事農奴、奴隸或更低下的工作。整個世界在古代和中世紀的社會結構，就像阿奇洛斯的著名悲劇「普羅米修斯」的第一部所說的那種社會結構：社會的上層是一批「世代相傳」的寡頭家族，即真實生活中的希臘奧林巴斯諸神；在其之下是走卒幫凶，他們根據奧林巴斯諸神的旨意管理人類的各個層面；最低層則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處於變幻無常的寡頭權威之下。

由於一四三九至一四五〇年佛羅倫薩會議的影響和在此影響下路易十一在一四六年繼承法國皇位，人類歷史得到徹底的改寫。在路易十一領導下，法國改造成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人類的等級秩序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其影響進一步擴展到全球，并延續到今天。向孤兒和窮人的兒子提供中學教育的人文主義政策，打破了原先寡頭家族統治下的慣例，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從牛馬不如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這種新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形式的主權民族共和國，就是現代的民族國家。

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新型國體，大大加快了潛在人口密度和勞動力的生產能力的增長速率，全面提高了家庭人口的素質。如果想到在現代歐洲各國和北美各國的國門之處提出各種正當的抗議，主權民族國家形態的任何一點削弱，都將帶來全球的自殺，其對人類的破壞程度將超過歷史上的任何犯罪行為。

這些新的文藝復興的社會制度，佛羅倫薩會議的政策和現代民族國家，一出現就與兩大寡頭勢力展開了特殊的搏斗。這兩大勢力是：封建地主貴族和由威尼斯貴族領導的金融寡頭。文藝復

興煥發的巨大的新興力量，在十六世紀幾乎摧毀了威尼斯。當時，威尼斯成績功地采用收買政策，讓其強大的敵人互相殘殺，瓦解了反威尼斯的坎布雷聯盟，從而使威尼斯得以生存下來。然後，它又繼續通過「均勢」外交手段，逐漸恢復了它的實力。不過，總的說來，在那之後的三百年間，所有企圖摧毀現代民族國家的封建勢力都失敗了。「神聖同盟」這一封建貴族帝國勢力的最後一個大型集團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間瓦解了，其殘存勢力到一次世界大戰就基本消失了。金融寡頭勢力的壽命要長些；薩爾皮在這一點上起了關鍵作用。

民族國家體系不可避免地擊敗了封建貴族帝國主義制度，其根本原因是民族國家對窮人家庭的子女採取人文主義的義務教育程度。由於重視未來的義務教育制度，再加上重視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勞動生產力，使經濟和戰爭手法都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這種重視教育的政策還帶來了一個結果，那就是從質量上提高了一個社會人平創造和消化科技進步的潛力。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帶來軍事火器力量和機動能力的提高。在堅定的現代民族國家面前，老封建地主貴族的帝國主義勢力必然遭到最終的失敗。

薩爾皮及其走卒決心在北歐的新教地區建立全球性的航海金融勢力，他們挑選荷蘭和英國作為全球航海勢力中心，并為之建立威尼斯寡頭體系的翻版。他們沒有直接摧毀民族國家，而是採取從內部攻破民族國家的手法，控制民族國家的財政金融，玩弄均勢遊戲，讓這些國家自相殘殺。在這樣的方法下，現代民族國家幾乎都采用了一種「混合經濟」：一方而具有民族國家當初重視農業工業投資并以之促進技術進步的措施，另一方面又讓金融寡頭勢力具有超級勢力，使之控制了民族國家的金融和貨幣機構。

薩爾皮在巴黎、倫敦和荷蘭的「新威尼斯人」對是否容忍現代民族國家制度施加了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以倫敦為中心的威尼斯式金融寡頭勢力必須控制世界的金融市場和各國的中央銀行機構。第二個條件：民族國家自己可被接受，但不可接受通過佛羅倫薩會議和法國路易十一為歐洲社會帶來新的「文藝復興」知識和精神。第三個條件：民族國家的關係必須是同樣的

「分而後治」（「均勢」）的關係，威尼斯正是用這手段讓坎布雷聯盟中它的敵人自相殘殺。

我們在這裡要說的是這三個條件中的第二個：這些威尼斯人和他們在英國的新威尼斯孝子賢孫們怎樣通過洗腦在人們心中消去文藝復興在知識和道德方面的廣泛影響，怎樣把民族國家這些嬰兒及其父母進行清腦處理，然後來收養民族國家。這里所討論的是：經驗主義為何通過文化戰，心理戰和哲學戰的方法來奴役它所統治的人們的頭腦。一旦認識到薩爾皮－伽里略－霍布斯－笛卡兒－牛頓所發展起來的數學是一種歪曲了的數學邪說，一旦認識到今天普遍接受的學院式社會科學理論是來自經驗主義數學，那麼，當今控制大多數美國人頭腦的機制就顯而易見了。這就是目前日益發展的經濟崩潰不可逆轉的關鍵原因。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薩爾皮的主要信徒康提（Conti）（23）發起的全歐洲沙龍在整個十八世紀是為何控制著歐洲各國前途的。從大約一五八二年到康提死去的一七四九年，威尼斯的代理人薩爾皮和康提是歐洲啓蒙運動的兩個最重要的人物，正是這兩個邪教術士從無到有建立了神秘的國家英國。我們在這裡還僅僅是談到了康提沙龍「之父」的某些最顯赫的劣跡。

康提的牛頓派成員中包括孟得斯鳩和伏爾泰這些名人。開創「自由貿易」（放任自流）思想的奎斯內博士也是康提沙龍的一個成員，在康提之後沙龍中最重要的人物有：一、威尼斯的教士吉爾馬里亞·歐特斯；二、沃特斯和弗朗西斯科·阿爾加羅提的老師比的基多·格蘭第（Guido Grandi）康提沙龍所控制的另一個重要的歐洲人是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二世，即所謂的「弗雷德里克大帝」。仇恨來布尼茲的康提牛頓幫控制了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柏林科學院：騙子毛伯圖斯，他在這個騙局中的幫凶尤拉，主持抵毀康德一七九〇年【論判斷】一書中美學觀點的「漂亮小伙」阿爾加羅特和皮埃爾－路易斯·拉各朗吉。在整個歐洲沒有科學思想的中心。牛頓在這裏如魚得水，因為康德的威尼斯沙龍網沒有染指于此。

也就是這一威尼斯沙龍網為了顛覆法國王室，部署了「秘密代理人」吉爾科漠·卡薩諾瓦

（Giacomo Casanova）和後來的亞力山德羅·卡里奧斯特羅（Alessandro Cagliostro）。

為了揭露這些薩爾皮和康提沙龍周圍這些威尼斯人如何歪曲數學和建立他們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必須研究一個關鍵人物：吉爾馬里亞·歐特斯（一七一三—一七九〇年）。此人是「馬爾薩斯之父」（24），也是全歐洲反文藝復興的主要協調人。這一運動導致了英國東印度公司里利伯里經濟學這一大雜燴，大雜燴則來源于亞當斯密、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馬爾薩斯、里卡爾多、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等人。

沃爾特斯等人在造就後來亞當斯密「自由貿易」空話所使用的社會理論可直接追根尋源到伽里略的數學學生哈伯斯和洛克。為要了解這一英國經驗主義教條，最好是讀一本荷蘭出生名為伯納得·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的無賴在一七二五年寫的一本書【蜜蜂寓言：私人邪惡，大眾得利】。曼得維爾明確表示「自由貿易」這一英國經驗主義概念的明顯前提是，即便是個人的邪惡行為也能為社會帶來最終利益。

倫敦<<金融時報>>最近的一個周末版（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十六日）揭示了這一點。作者里阿爾·瓦特森（Lyall Watson）絞盡枯腸，以典型的牛津劍橋式「英國理解方法」來證明這一點。這篇刊載在周末版第一頁的文章題為「食人生番」，該文的刊頭是一幅佔了六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原始的阿斯瑪特食人生番部落人，一只刺餓貼在生番臉上。照片的說明這樣寫道：「阿斯瑪特人把人口變動壓力轉變為一場特有奇怪的樂事：他們幸福快樂地吃自己」。我們可以引用幾段文中的話，以向讀者證明瓦特森（以及<<金融時報>>）是在認真地鼓吹人食人，我們也可以此讓讀者深入了解不僅是曼德維爾，而且還包括哈伯斯、洛克和歐特斯等人的思想。

瓦特森這樣開始：「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是食人生番。他們住在卡蘇阿里納海岸，即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的阿里安三角州…他們大約有兩萬人，他們稱自己為阿斯瑪特，其意思是「人類」。所有外來者一概稱作，馬諾維，，意思是‘可以吃的東西’」。在文章的結尾處，瓦特森在談到經驗主義時對英國的哲學大加美化：「人

類在某些時候也具有侵略性和崇尚暴力，這在阿斯瑪特人看來並不成問題，而且也不需要從民心上加以自責。這已成為他們的習慣與傳統；使他們得以毫無拘束愉快滿意地進行獵人活動，與之同時又解決了緊迫的環境問題…我們從這裡看到了希望，我們只有以阿斯瑪特人為榜樣，學會如何靈活地調節自己以實現平衡發展。」

這完全就是曼德維爾的「私人邪惡，公衆得利」的意思，是亞當斯密在一七五九年<<道德論>>一書中所說的個人道德的全部意思。奎斯納也是使用了這樣的概念來爭辯社會必須得益于不干預封建貴族農奴主變換無常的胡思亂想，即所謂「放任自流」。亞當斯密在他一七七六年<<原富論>>一書中則借用了奎斯納的說法來證明他對「自由貿易」的宣揚。哈伯斯在<<巨獸>>一書中是這樣講的，這也是洛克和盧梭的道德觀念。正如<<金融時報>>所反映的那樣，這是當今典型的英國經驗主義思維邏輯，是英國外交人員和聯合國官員在解釋為什麼波斯尼亞必須服從塞族軍隊的強殲和屠殺時的思維邏輯，也是這些官員在解釋為什麼需要保障在倫敦和米羅塞維克塞族武裝力量控制下恢復統一的南斯拉夫時使用的思維邏輯。

若要明白霍布斯、洛克、曼德維爾、亞當斯密和瓦特森對個人邪惡的奇妙鼓吹，我們需要從有關的數理學角度來分析上面提到的這些經驗主義謬論。

設想劍橋大學加油系統的機械模式，如克爾文或瑞雷爵士的新鮮玩意兒：挪威系統。想象一下：數百萬個小球在一個否則是真空的空間中亂滾。記住所謂海灘幻想，你一時突發其想，租用一輛電動車，朝著其它汽油車撞將而去，同時又被其它車撞。因此，這些汽油小分子顆粒相互激烈碰撞，以一種更復雜的方式互相輻射。

現在設想一下這些小球都被七大邪惡或更骯髒的東西所激勵。除了由此引起的互相撞擊之外，它們也相互向對方輻射出罪惡和邪惡。再想像從這種互相撞擊和輻射的罪惡中產生一種社會善良。設想這一事件的發生是因為瑞雷加油系統通過某種機制而獲得了壓力和溫度；這種機制與伽里略、霍布斯、牛頓等人的靜態平衡機制沒什麼兩樣。在這裏，你所看到的理論模式構成了霍布



「他將死於什麼病？」驢醫師為人診斷圖是十八世紀西班牙畫家哥亞的妙筆。哥亞又說：「醫師他又好，又貴，又體貼，又安靜，又認真？人們還能再要求什麼？」（要它得諾貝爾經濟獎嗎？）

斯、洛克、曼德維爾、吉爾馬里亞·歐特斯、亞馬斯密、杰里米·邊沁、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約翰·紐曼等人所創立的社會理論和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建立這些社會理論的大好時機是啟蒙運動的十八世紀。在這方面的中心人物是康提沙龍的歐特斯。歐特斯認為，所有的社會發展進程都可以歸納為一種機械模式，可以用牛頓的代數模式來解釋。在歐特斯的思維方式為英國人和歐洲大陸上的牛頓走卒所效法之後，經驗主義和大陸實證主義開始大規模地炮製各種新社會理論；這一過程從十八世紀的後半期一直持續到今天。這些新理論全都是些垃圾，但無恥之徒們卻稱之為「科學」。不過，這只是使垃圾「專業化」罷了。

### 三、控制是如何開始的

母親打開廚房的門，驚呼：「孩子！你怎麼又把你的手伸到餅乾筒里了！」這孩子迅速抽出手，裝出一番可憐的無辜象：「什麼餅乾筒？」

并非所有的江湖騙子都願意認識到他們是在制造騙局。

詩人劇作家和歷史學家席勒為這類江湖騙子的一個重要派別起了名。在英語中，這一名稱就是指那些在大學里學習如何在畢業後找個高薪工作的專業人士。生產這些成品的學生往往向老師發問：「老師，這在考試中會不會出現？」意思是說，學生認為，老師若講授學生在今後得不到物質利益的科目均是不道德的。按本文作者長年

的經驗，美國的大多數專業人士均是些急功近利之徒。

誠實的科學家比任何急功近利之徒都辛苦得多，也嚴肅得多。他們的動力是取得科學發展時的歡樂，就像真正優秀的職業音樂家一樣，為其演奏的成功而高興。他們的動力是：在從事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嚴肅工作時，他們感覺到一種高尚和幸福，要不，他們不會長年累月地付出大量投入。不要相信經驗主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偽善言詞，不要相信他們那愚蠢枯燥的「從好處著想，從壞處著眼」之類的說教。從事有意義工作的基本動力是：這一工作充滿樂趣，做這樣的人比做什麼樣的人都快活。

如果考慮到人終有一死，千人的一生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那麼，以這樣的方式來獲取樂趣則更有意義。一旦個人的最大興趣是掌握那些必然帶入墳墓，而並非生色犬馬的東西，那麼這一樂趣就是永恆的，因為這個世界在你離開的時候，比你在歷史瞬間之前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時更好。

一旦人們明白了什麼是樂趣，其頭腦中就常常會充滿一些問題，即那些急功近利之徒可能永遠也不會提出的問題。急功近利之徒認為，個人的利益和興趣是從短暫的一生中為何獲取，而有樂趣意識的人則是關心在這歷史瞬間如何付出。因此，急功近利之徒比有樂趣意識的人要愚蠢得多，也要難受得多。一些嚴肅的實際主義者通常把眼睛盯在最大的機會上，他們也許會站出來為牛頓辯解：「嘿，朋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如果你想走在人的前面，學著接受事物和各個世界運動的規律吧。」這些嚴肅的可憐蟲絕不會問到：在牛頓主義之外有什麼樣的數學？他絕不會從已知的人類歷史中想到，所有經驗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就一開始就荒謬絕倫。

因此，我們所有提及的事實可能只能為兩類人認識到：一是有樂趣的人，一是希望人類不致墜入新黑暗時代的人。我們知道，在這新黑暗時代里，地球上的人口將在饑餓、流行病和人吃人的自我屠殺中急劇減少，從今天的五十億減到二十至四十年後的不足五億。

那些急功近利之徒，無論他們是大學畢業還是文盲，其本質就是經驗主義傳統在其心中至高

無上。這就是經驗主義傳統如何盡力保證其成了大眾化標準。

對選擇人生樂趣的人來說，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個問題是表明個人本性的事實證據：正為摩西在【創世紀】第一章所說，造出的宇宙是善良的，人之初不僅性本善，而且是造物主造出的最高尚之物。正如本文作者在其大半生所堅持認為的那樣，如果人類只不過是一種動物，接受動物生態規律的控制，那麼在近兩百萬年的地球新生代晚期期間的任何時候，人類的人口都不會超過幾百萬。人類與動物不一樣，他們有著創造性的精神思維力量，可以把科學原則的發現付諸實踐，從而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提高人類的潛在人口密度，改善家庭人口的素質。

第二個問題：既然人類的存在取決于自然科學和其它科學領域內永不停息的科學原理發現，那麼人類知識的本質是什麼？數學形式主義把知識看作是某種演繹性公理格柵，那麼，我們如何表示超出現有公理格柵的知識進步（改革）？選擇樂趣的人嚴肅認真始終不懈地探尋這一問題，他們最終成為柏拉圖、庫沙、達芬奇、開普勒、萊布尼茲、高斯和黎曼的追隨者。

這裡有兩個概念需要掌握。第一，柏拉圖所定義的「思想」這一概念，本文作者在一九九五年春季號的【菲德里奧】雜誌中已經討論過。第二，要使數學成為有用的工具，我們必須從外界把實物科學原則引入數學。這些原則在我們看來是科學的「思想」，即柏拉圖的思想概念，亞里斯多德、薩爾皮和牛頓之流永遠不具有的思想概念。只有掌握了這些概念，明白了這些思想的意義，人才不會遭受「大眾文化」的污染，因而可以擺脫稱為經驗主義的信心遊戲。

需要明白的關鍵一點是，流行的大眾文化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人工合成文化。它由現以倫敦為中心的勢力強大的國際寡頭所創造和定型。這些國際寡頭長期以來一直力圖遏制和控制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現在又決心要摧毀它。一旦認識到，充斥牛頓學說中無可辯解的騙局是什麼，充斥經濟學教育和社會理論的騙局是什麼，人們就不會再迫不及待地相信「媽媽所說的餅乾筒并不存在。」

## 注釋

1. 見 Barbara Tuckman,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Fourteenth Century"【遙遠的鏡子：災難深重的十四世紀】(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亦見 Miriam Beard, "A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Man"【商人的歷史】(New York: MacMillan, 1938)。
2. 即整個勞動力的人平數量。
3. 比如，若要保持實物經濟生產力（即勞動力人平、戶平和每平方公里使用面積的實物經濟指標）的純增長率在一九六三年的水平上，整個勞動力大軍中大約要有百分之五的人從事與實物經濟有關的科學和工程技術工作。這里指的是三大發達國家（美國、德國和日本）的這些指標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〇年間的比較。如果從事技術發展工作的人數和與之有關的機床製造業就業人數低于這以百分比，經濟將遭受實物經濟純下降。
4. 不要忽視這里所含有的一個關鍵之點。一個社會如何使用多余的「自由能」？一個頭腦健全的社會將把大部分多余自由能不僅投入來增加經濟規模，而且還將投資來提高系統能中按人平、戶平和地平衡量的各有關內容。這樣，一個「可持久的」經濟就要求不斷提高資本密集和能量密集程度。要在整個過程的各個階段把「自由能」與「系統能」的比率「持續地」維持在最低水平上，要求實物經濟產出中用于再投資的部分不斷提高。這後一個條件只能靠生產技術和其它有關技術的發展來解決。另一個限制條件是在一定技術水平上自然資源的相對有限性。這一問題也可以通過生產技術和其它有關技術的發展來解決。
5. 對一個系統非熵的衡量是由數學家喬治·坎特 (George Cantor) 提出的。一個物理過程相對非熵的數學表達產生於對一個系統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承繼狀態的相對基數增加所進行的比較研究。這一增加即每一任意選擇的間隙的定量數學不間斷性的密度增加。在實物經濟中，生產性勞動力「持續」增加的原因是導致技術進步效果的知識（合理原理的累計發現）的增加。這一非熵的功能是本文作者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間發現的，當時我決心揭露威納的騙局，揭露他用機械式的統計學「信息論」來表示人類知識。本文作者用坎特的著作來表示伯恩納德·里曼一八五四年的論文「論幾何基礎的假想」的一些深層的含義。這樣，運用里曼的著作來解決精確表達本文作者先前所定義的實物經濟問題，就成了看起來不規範、但卻準確的「拉魯旭-黎曼方法」。
6. 一九六四年的兩個最典型的重要事件是羅伯特·西伯德的【第三次革命】一書的出版和進口的「披頭士」音樂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專題節目中出現。【第三次革命】是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伯爾特蘭德·羅素 (Bertrand Russel) 的走卒羅伯特·哈欽斯 (Robert Hutchins) 民主研究中心的產物。自一九六四年披頭士出現以來，「搖滾樂」迷的大量產生是撒旦崇拜者阿雷斯特·克勞力 (Aleister Crowley) 的追隨者和唱片音樂會黑幫中的「聰明人」的共同努力結果。即便在一九六四年的十五年之前，本文作者在抨擊反理性的「信息論」過程中，了解了那些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煽動反文明文化中起了關鍵作用的機構。
7.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九七四年明目張膽的屠殺政策綱要，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此件未發表，載于華盛頓國家檔案館）。
8. 見「橡膠套套進入國會」，Webster G. Tarpley and Antony Chaitkin, "George Bush: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喬治·布什：非正傳】(Washington, DC: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1992)。
9. 布熱津斯基：「兩個世紀之間：美國在電子技術時代的作用」，在哥倫比亞大學共產黨事務研究所的主持下撰成。
10. 見威廉·里斯-摩格「沒有教條的教條：許多新形式的宗教正在掙脫等級觀念返歸純真」，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里斯-摩格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熱衷者，也是美國眾議院議長金格里奇的主要支持者。
11. 里斯-摩格爵士提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完全不應接受教育。他提出受過教育的百分之五在與世隔絕的地方（如英吉利海峽的某些孤島）創造托夫勒的「信息」，向未來世界提供全球「第三次浪潮」這一天方夜談的所有所需的財富。
12.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五十多年間一直是英國海外情報機構有影響的官方代理人。見基辛格「伙伴關係的反省：英美戰後對外政策的態度」，這是基辛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在杰利米·本森創立的英國外交部兩百周年紀念日上發表的演講。他說：「我在白宮期間〔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七年〕，我與英國外交部的對話和關係超過美國國務院…」

13. 聖吉爾梅因-加爾恩法在八十年代放鬆了對美國銀行體系的控制。平衡預算法則要求聯邦政府實施平衡預算。
14. 約翰·馮·紐曼和奧斯卡爾·摩根斯特恩，「博弈論和經濟行為」。
15. 所謂「混沌理論」是一門新鮮的偽科學，它來自牛頓、牛頓走卒尤拉和奧古斯丁·考奇等人在無限系列上的錯誤理論。這一理論在一開始就采用牛頓著名的拉丁箴言「假說並非必要」。在這裡，「混沌論」者做了一個明顯的假說，互相排斥的數理公理格柵中固有的不一致性被代表的數學非連續性可以在「無窮大處」一致起來。因此，考奇的目的不僅僅是篡改萊布尼茲的計算數學，而是以極大的狂熱來閹割萊布尼茲的計算數學。
16. 不少科盲常常發現，即便是學富五車的專業人士也搞不清「非熵」和「非線性」的區別。正如本文在早些時候談到的，如要從數學上表達非熵的實物生產過程，如實物經濟，只能使用坎特的方法，即觀察隨機選擇的時間範圍內數學不連續點的密度。就人類的總文化而言，一種文化之所以優于另一文化，原因是技術進步。這種技術進步反映出實物科學和古典文化中累積的真實發現（先前確立的公理格柵中的數學不連續點），這些發現構成了灌輸到當今社會成員定向思維中的歷史累積的不連續點。那些錯用「非線性」來表示「非熵」的人表明，他們對一直持續到本世紀的這場主要科學方法之爭完全無知。在這場爭論中，一方是里歐坡爾德·克羅內克（Leopold Kronecker）、詹姆斯·科樂克·馬克斯維（James Clerk Maxwell）和瑞雷，另一方是高斯、韋伯、黎曼、卡爾·威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
17. 人們了解最多的來布尼茲對牛頓著述中主要謬論的批駁，可見諸于來布尼茲與克拉克的通信錄。
18. 在十七世紀初頁，法國迅速轉變為民族國家，成為科學技術水平最先進的國家。一七九四到一八一四年間在蓋斯帕爾德·蒙吉和阿德里安·勒金德雷領導下的巴黎理工學院是這一科技成就的典範。大約到一八二七年，隨著克雷爾的雜誌問世，高斯、洪堡、德瑞席雷特和後來的里曼的德國在科學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且這一領先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19. 讓我們以牛頓發現的「萬有引力」定律這一騙人的學說為例。牛頓的引力公式是直接從開普勒發現的同樣著名的熱力學第三定律推導出來的，開普勒就是用這一第三定律來定義最初由開普勒發現的萬有引力的度量。
20. 弗朗索·奎斯納，「經濟表」（一七五八年）。奎斯納是一個宮廷醫生，威尼斯情報機構的主要人物阿伯特·安東尼奧·康提的代理人，包括馬克思和紐曼在內的所有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中心思想的開山鼻祖。
21. 亞當斯密是十八世紀中頁到後期倫敦最有權勢的人物謝爾伯恩（Shelburn）的走狗。謝爾伯恩在一七八二至一七八三年間出任英國首相期間建立了英國外交部（一七八二年）。他是與東印度公司和巴林斯銀行有密切聯繫的重要寡頭。
22. 現代法學中兩大非理性逆流是兩個類似但又具有不同來源的思潮：一個來自於英國經驗主義者約翰·洛德（一六三二至一七〇四年），一個來自於德國的新康提實證主義者弗里德里奇·塞維格尼（Friedrich Savigny）（一七七九至一八六一年）。在三十年代期間，塞維格尼的思想是奠定納粹法的主要工具。如果完全棄洛克的觀點來解釋法律，就可能形成比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更激進的法西斯暴政。
23. 安東尼奧·康提是十八世紀最重要的寡頭人物，但今天的歷史學者對之了解很少。他的主要目標是調動全歐洲大陸的力量，推崇對牛頓的崇拜，以圖謀毀來布尼茲的名字，消除他的影響。
24. 吉爾馬里亞·歐特斯的著作是托馬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礎。羅馬俱樂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塞入人口政策討論的「承受能力」概念直接來源于沃特的著作，而不是來源于馬爾薩斯。